

《双城史》和弗赖辛主教奥托的历史哲学*

汪丽红

【提要】 弗赖辛主教奥托的《双城史》因鲜明的末世论备受争议,但也以其富有哲学思想的历史阐释屹立于西欧史学通史中。该书以“双城”为线索重新审视人类既往历史,在时间上反省基督教一元世界年表,在空间上修补“帝国转移说”。作者试图为11—12世纪剧烈的政教冲突寻求历史解释,客观上化解了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以来基督教史学对历史时间的消解,重塑了早期基督教通史著作普遍缺失的进程感。

【关键词】 弗赖辛的奥托 《双城史》 历史哲学

1143年德意志巴伐利亚地区弗赖辛的主教奥托(Otto of Freising, 1111/5—1158年)着手编写一部上起亚当下至当代的普世编年史,历时3—4年完成初稿,10年后在助手拉赫温(Rahewen)的帮助下补充修订,共计8卷,1157年敬呈皇帝腓特烈一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双城史》。^①该书被誉为“从329年攸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到1735年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历史学习书信集之间最重要的哲学性史著。至少是从426年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到1680年波舒哀《论普遍历史》之间的主要作品”,^②J. P. 汤普逊亦盛赞“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因为有如此深刻、如此博学、如此富于哲学思想的历史阐述而自豪”。^③一部主教书写的浸透着神学思想的中世纪史学著作何以享有如此盛誉?本文拟从时间、空间和事件编排三方面,分析在“牢牢嵌入他自我意识到的末世论历史观”^④掩藏之下,奥托夹在基督教解释框架与时代命题之间形成的历史哲学,以便“从中世纪看似荒谬和漏洞百出的历史编纂中,承继其有价值的史学遗产”。^⑤

一、从一元的世界年表到多维度的历史时间

《双城史》在体例上属于编年通史序列,考察《双城史》的编年特征尚需简单回溯西方基督教史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世纪文艺复兴与通史编纂中的‘世界主义’”(项目编号:19BSS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in usum scholarum* 的编者霍夫迈斯特(Hofmeister)以《弗赖辛的奥托的编年史或双城历史》(*O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冠名,英译者查尔斯·克里斯托弗·密洛则以《两个城市——弗赖辛主教奥托的世界编年史,至1146年》为名,即本文使用版本:Otto, Bishop of Freising, *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 D.*, trans.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ed. by Austin P. Evans and Charles Knapp,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目前所见中文称呼有:编年史、年代纪、《两个城市的编年史》《双城史》等,本文根据英译本简称为《双城史》。

② Felix Fellner, “The ‘Two Cities’ of Otto of Freis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athol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20, No. 2, 1934, pp. 168–170.

③ J. P.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5页。

④ Denys Hay, *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Methuen & Co Ltd., 1977, p. 53.

⑤ 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中世纪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学传统。公元3世纪出身非洲的基督徒阿非利加努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 180—250年)撰写《年代志》(*Chronography*)根据圣经上帝七日创世以及“千年如一日”的说法,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七个千年,初步确立了从上帝创世到千禧年的基督教时间观。325年攸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 263—339年)撰写《编年史》,通过年表将旧约和新约与巴比伦、亚述、米底、波斯、埃及、希腊、罗马等地的历史进行历史年代同步化,^①完成了将犹太民族史时间推进为普世时间的重要一步。5世纪初奥罗西乌斯(Paulus Orosius, 375—418年?)编写《反异教史七书》(*Histories Adversus Paganos*)叙述从创世纪到罗马建城第1168年,共计5618年的历史。至此,基督教史学从一个起点开始向未来延伸并即将终结的时间轴基本完成。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帝统纪年权威性下降,各地宗教人员继承上述世界时间表,并逐步精确化。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 560—636年)将历史时间划分为六大阶段:创世到大洪水(第2242年结束);大洪水到亚伯拉罕(第3184年结束);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结束于4125年);大卫王到巴比伦之囚(结束于4610年);巴比伦之囚到耶稣降生(结束于5155年);耶稣降生到当代(截至创世第5814年),同时指出“世界剩余时间非是人的考察所能明了的……主根据权威所确定的时间或时刻不是你们所知道的”。^②725年,比德(Bede of Wearmouth-Jarrow, 672—735年)编写《时间推算》(*De temporum ratione*),详细推演了世界的六个时代。尽管历史编写者们对时间跨度和节点日期存在不同意见,但六个时代的划分基本奠定了中世纪史学的编年框架,至此柯林伍德所说“由赛维尔的伊西多尔在7世纪所创立的并在8世纪由可敬的比德所普及的”^③一元的世界年表确立。

中世纪早期形成的一批历史著作,形式上接近通史体例的有《741年普世编年史》、弗赫加夫的《编年史》和维也纳的阿多的《编年史》,还包括一些从创世纪开始但重在当代的历史著作,如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等。在一元世界年表笼罩下,以神职人员为主体的写作者偏重历史的教牧功能。既然上帝早已安排好时间计划,前辈教父也已一一写明,历史书写者们便不再过多关心具体时间,“教会在9世纪到11世纪间陷入到封建社会之中,封建社会使对历史的思考停滞不前,似乎停止了历史时间,或者说是将它等同于教会史”。^④

中世纪进入盛期后,社会经贸活动的复苏增强了人们的时间感,进而导致“时空范畴发生变化,失去其传统内涵”。^⑤玛瑞亚努斯·司各脱(Marianus Scotus, 1028—1082/3年)推算基督降生和受难的准确时间,校订流传下来的一元世界年表。米歇尔斯堡的弗卢托福(Frutolf of Michelsberg, d. 1103)“关注年表”,^⑥编辑了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第一部世界通史(*Chronica*)。^⑦在前辈史家^⑧审视时间基础上,《双城史》亦从以下几个方面反省和探索了历史时间。

首先,对一元世界年表的疑问。《双城史》以亚当被逐伊甸园开篇,第二次关注时间是在大洪水,

① 参见方志强《古代西方的普世史传统》,《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Isidore of Seville, *Chronicon*, 英译参见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sidore_chronicon_01_trans.htm [2020-01-11]

③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2页。

④ 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周彝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0页。

⑤ A. 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6页。

⑥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123-124.

⑦ 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中世纪时期),第228页。

⑧ 弗卢托福的《编年史》史料丰富,流传广泛,抄本颇多。密洛等认为该书对奥托影响甚深,他停止借鉴前人资料的时间是1106年,而恰恰就是艾克哈德(Ekkehard of Aura)续写《世界编年史》最后的编年。

第三次关注时间在亚伯拉罕,但很快奥托指出传统计年混乱不堪。“从亚当到大洪水,根据《反异教史七书》过去了2262年;根据哲罗姆则过去了1666年”。接下来“根据《反异教史七书》,从大洪水到宁录(Nimrod)和希伯(Eber)在位有531年。但是根据哲罗姆的估算只有101年”(Chron. I.3)。继而在亚伯拉罕的年代问题上,奥托抱怨说“在他们的记录中,关于两个时段(大洪水到亚伯拉罕、巴别塔到亚伯拉罕)计年的讨论绝对是一团乱麻”(Chron. I.4)。

奥托顺势放弃以犹太-基督教纪年为主线,转而重点讲述四大帝国更迭为主线的地上之城,由此开始各种俗史纪元。上帝之城居民的历史沦为副线,士师时代、大卫王都被一带而过,直到基督降生于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皈依,双城合而为一,奥托才将基督纪年和奥古斯都纪年并列编年。该书第1卷以尼努斯统治纪年为主线,第2卷以罗马建城纪年为主线,第3—7卷保持基督纪年和奥古斯都纪年并立,人类历史呈现为三大阶段:尼努斯到罗马建城的古史、罗马建城到基督降生的罗马史、基督降生到作者生活时代的帝国和教会史,属人的历史节律自然显现。教统树立的一元世界年表至此大为失色,“六个时代”保留了教义价值,作为参照系的时间轴^①的实际历史分期作用降低。

其次,由于地上之城及其王国占据了实际上的优先地位,^②《双城史》记录了古代各国历史,重拾亚述王表、波斯王表、奥林匹亚纪年、罗马建城纪年、奥古斯都纪年等众多历史时序。复数时间的设置便于奥托观察并贯彻“文化转移”说。“细心的历史学生会发现学习中心从埃及转移到希腊,又从罗马人最终转移到高卢和西班牙人那里。我们观察到,所有人类权力和知识源起于东方,终于西方”(Chron. Pr.)。他认同埃及人称希腊哲学家幼稚不成熟(Chron. Pr.),观察到希腊人智慧超拔其他民族(Chron. I.16),而到了罗马“随着这个时代日渐成长进步——部分通过住在一起的人们合作,部分通过集中智慧建设法律,部分通过智囊团体和哲人的教诲——适合救主道成肉身,为世界建立新法,此时,如我已说,整个世界已臣服于罗马人的力量,已被哲人智慧塑造,人们的思想已适合抓住正确生活的崇高法则”(Chron. III Pr.)。为此,奥托在讲述各帝国历史时,不忘追寻人类智慧发展的脉络,留心从古至今各地文化名人及其成就,不仅为非基督教文明留下了存在空间,还隐含了对人类智慧和理性的认可与赞颂。

再次,由于地上之城各有纪元,复数的时间在《双城史》中呈现出缓急不同的流速,奥托注重时间之流的交汇,比如罗马建城在“尼努斯统治的第1300年,特洛伊陷落的第414年,第6次奥林匹亚运动会,亚当之后4484年,亚哈斯统治犹太(或根据奥古斯丁,是其正义的儿子希西家),何西阿或比加二世统治以色列时期——罗马,最伟大最著名的城市在帕拉丁山上建立”(Chron. II.3)。基督降生“这是发生在凯撒·奥古斯都统治第42年(罗马)建城第752年,第193次奥林匹亚运动会,亚当后5500年,异邦人安提帕的儿子希律统治朱甸(Judeae)时期,根据但以理书是第66周”(Chron. III.6)。奥托每到他认为的重要历史事件即进行纪年对观,以便读者在多重时空交错中确认坐标。

年代对观增强了奥托的时间敏感性。如《犹滴传》^③究竟发生在哪任亚述王统治时期,奥托综合分析了《犹滴传》、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和罗马人所写史书相互矛盾的观点,论断该事件应当发生在冈比西斯治下而不是居鲁士时期(Chron. II.15)。再如他看到资料说西

① 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9页。

② Peter Classen, “Res Gestae, Universal History, Apocalypse: Visions of Past and Future”, in Robert L. Benson, Giles Constable and Carol D. Lanham eds.,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00.

③ 犹太妇女犹滴挺身而出设计杀死亚述大将的故事。参见《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7—68页。

奥多里克、阿提拉和埃马纳里克(Ermmannarick)三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奥托辨析:阿提拉是在埃马纳里克后很久才成为统治者的,西奥多里克则是在阿提拉死后被父亲作为质子送给罗马皇帝利奥的,当时他才8岁,由此否定这一记述(*Chron.*, V. 3)。因此,虽然《双城史》当代以前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前人作品,但认为其只是“基于所有熟悉的权威,以最方便的形式进行了转录和解释”,^①显然并不恰当,“历史学家的技艺就是去除和避免一些事情,予以选择并进行恰当地编排;因为它就是要避免谎言,选择真相”(*Chron.*, Dedication) 作者奥托在时间的处理上表现出相当的理性。

二、“帝国转移”形成的历史空间

《双城史》开篇指出“世界分三部分:亚洲、非洲和欧洲。前者是后者面积之和。然而有人宣称世界只有两部分,亚洲和欧洲;非洲因面积太小附属欧洲。宣称非洲为第三部分的人不是考虑大小,而是根据大海涨落”(*Chron.* I. 1) 基督教世界边界的拓展在其中反映并不显著,“过去的罗马和现在的日耳曼仍然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点;他们所知的东方仅仅是十字军东征产生的功效”,^②然而该书以四大帝国更迭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空间。

四大帝国更迭源于古罗马史家对地中海世界帝国兴亡更迭的模糊认识。《但以理书》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见一块巨石从山上滚落,依次砸碎一座雕像精金的头部、银制的臂膀和胸膛、铜制的肚腹和腰、铁制的腿和半泥半铁脚,但以理解梦,将雕像解释为由巴比伦开始前后相继的大帝国,将巨石意象解释为“天上的神必立另一国,永不败坏”(但2:44)。哲罗姆等教父将但以理的帝国更迭——对应历史上影响波及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几个帝国:亚述—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马其顿^③和罗马,经神学阐释后,帝国更迭从历史变迁演化为符合神法的普世君权(*regimen universale*) 在世俗政权之间转移。奥托从熟悉的教父作品中找到帝国转移说,以之作为《双城史》地上之城的主体叙述结构创建历史空间秩序。

亚述王尼努斯“据说是第一位没有避免用鲜血污染人类,而是将战争的不安施加于世界,将整个东方实际纳入自己控制之下的国王”(*Chron.*, I. 6)。第一个建立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帝国,帝国转移进程由此开始,空间上自东向西推进,依次是亚述—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但四大帝国地位并不平等,“罗马人继承了巴比伦人的王国就像儿子继承父亲。因此当它还处于少年时期——甚至可以说婴儿——我们上文提到的两大帝国(波斯和希腊)是它的守护者,或者说引导者”(*Chron.*, II. 27),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书重心何以落在罗马帝国。

古代地中海世界以“帝国”为核心形成差序政治格局,帝国转移作为一种叙事结构可以有效地串联散落在欧亚非的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奥托将人类视为一个拥有共同祖先的共同体,随时间推移演化成分布在欧亚非大陆的众多民族,众民族相互依存又彼此竞争,从而建构了一个整体历史时空。而历史形成的“诸帝国是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是曾将权利扩及广大空间的,以及当其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的诸政治形态”。^④ 奥托叙述四大主体帝国历史,也从

① Denys Hay, *Annals and Historians*, p. 53.

② Andrew Marsham, “Universal Histories in Christendom and the Islamic World, c. 700 – c. 1400”, in Sarah Foot and Chase F. Robin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2: 400 – 14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51.

③ 奥罗西乌斯认为第三大帝国是迦太基。

④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页。

未忘记世界的其余部分 如讲述亚述帝国时谈到“与此同时,贝洛斯在位第45年,欧洲兴起了一个西西尼亚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Sicyonians) 紧接着叙述臣服于亚述的埃及王国等,始终保持历史空间的开拓或延展。在这一叙述过程中,他以中世纪的思维方式观察到民族之间的融合:如埃涅阿斯(Aeneas)娶了意大利国王拉丁努斯(Latinus)的女儿并统治了拉丁姆地区后,“从这时起,希腊人和拉丁人合为一条血脉,就是说语言和风俗开始有了亲缘关系……”(Chron., I. 27);“发现”区域之间的整合“通过罗马人的征服,世界已然连成一体,并在奥古斯都·凯撒的统治下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Chron., III. Pr.)。作者处处留意以战争、联姻、传教、迁徙等多种方式触发世界其余部分的历史,建立起与主体帝国历史的关联,形成了历史叙事内部主次分明、多重关联的空间秩序。

可是476年日耳曼首领奥多亚克废黜末帝,西罗马帝国覆灭,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帝国西部的后续历史?奥托沿着四大帝国自东向西转移的路径,继续向西推进普世君权转移,依次从希腊人(拜占庭)、法兰克人、伦巴底人转移到德意志人手中。但是经文所定教父所释的四大帝国模式不可更改,奥托于是认为后续历史是普世君权在罗马帝国内部不同家族之间转移,帝国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老体衰,就像“曾经光滑的卵石,在水的作用下不断翻滚,染上污渍,增添许多凹凸不平”(Chron., pr.)。随着奥托叙述重心向西欧推进,历史空间亦逐渐向西铺展。

普世君权从巴比伦、波斯,一路向西转入希腊,再到罗马,形成相对完整的承继链条,这意味着源自远古、集大成于罗马的“帝统”遗产如今被德意志合法继承。“基督道成肉身第964年,荣耀的国王奥托,从帕维亚行军至大城,受到宗座约翰和所有人民的认可和尊敬,在普世欢呼中接受了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头衔……于是,继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之后,罗马人的统治威权转移给了德意志人……”(Chron., VI. 22)。雅克·勒高夫认为弗赖辛的奥托用这种时间的延续性证明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神圣性,^①实则奥托的策略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双向展开的。

1158年德皇腓特烈一世二度出征伦巴底,在隆卡利亚召集会议(Diet of Roncaglia),与会各方就德皇对意大利北部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展开激烈辩论,波隆纳的法学教师援引罗马法,论证腓特烈一世作为罗马人的皇帝,是“世界之主”,拥有普世治理权。奥托虽然因病未能随军参会,但此前一年《双城史》已经通过廷臣送达皇帝手中,正如献词所说“你迫切想知道的古时候国王和皇帝做了些什么,知此不仅为了以武力更好地保护国家,还为了用律令法规更好地建设政权”(Chron., Dedication)。该书强调的“帝国转移”论从神权和历史继承两个层面坐实了腓特烈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尊号的正当性,证明“保护整个世界的权力属于皇帝”,奥托敬献《双城史》可谓恰逢其时。

无独有偶,奥托去世后不久,1176年法国特鲁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创作诗体传奇《克里奇》(Cligès)将帝国转移的终点定在法国;100年后,英国布里的藏书家理查德(Richard de Bury)再次推进帝国转移,毫不意外这次的终点是英国。帝国转移说的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世纪盛期西欧民族意识觉醒,知识精英纷纷从古代文化遗产中为本民族崛起寻找理论依据。正如兰克批评,千年王国或者但以理所预言的四个王国[更替]远不足以涵盖整个历史,^②面对西欧后起政权,奥托受限于四大帝国模式,判断当前帝国正在走向衰亡。但是四大帝国更替的叙事结构搭建了《双城史》广阔的历史空间,自东向西的转移路径形成了德意志民族在世界历史时空里定位自我的认知模式。民族关切帮助奥托在普世历史中聚焦问题,世界主义则有助于平衡民族主义的偏狭,正是民族主义

①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② 兰克《论普遍历史》,参见刘小枫编《从普遍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页。

的立场和世界主义的视野共同促成了奥托“戏剧性历史观的宏大气象”。^①

有趣之处还在于从空间角度看,《双城史》讲述了一个世界从整体走向分裂的悲惨故事,“在其深处,我们看见小的被大的吞掉,弱的被强的吞掉,最后,如果没有其他猎物,强的就把自己撕成粉碎”(Chron., VI. Pr.)。而其下似乎又潜藏着由分裂通向整合的若干小径,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感觉”,^②直至千年王国,世界再度恢复成没有差异的均质空间。

三、12 世纪的时代问题和历史意识

弗赖辛主教奥托并非普通贵族出身,是奥地利伯爵利奥波德三世和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女儿阿格尼斯的第五子。作为幼子,他加入了蓬勃发展的西多修会成为修士、院长,后被召回担任巴伐利亚地区弗赖辛主教一职直到21年后去世。因为与德意志皇室关系密切,他曾经陪同康拉德三世参加十字军东征、帮助腓特烈一世调解巴伐利亚伯爵争端,身处权力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奥托十分关切政局。

962年奥托一世(Otto I)在罗马接受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获奥古斯都称号,教皇旋即反悔,与奥托的敌人结盟,奥托一怒之下大军压境,召集贵族会议废黜约翰十二世,由此拉开了德意志历史上政教冲突的大幕。1076年主教奥托的外祖父亨利四世废黜格里高利七世,后者立刻将皇帝革除教门,发生著名的“卡诺莎觐见”事件,此后历任教皇与皇帝的冲突未曾停息。《双城史》编年截至1146年,就在该书修订期间德意志的政教斗争愈演愈烈。1152年腓特烈一世当选为德意志国王,1154年应教皇尤金三世请求出兵罗马,加冕为帝,期间与新任教皇哈德良四世发生礼仪之争;不久又因教皇书信中使用“beneficia”(含赐予之意)一词再起争端。双方矛盾持续升级,皇帝宣称“因为通过上帝的授职,我被称为,而且事实上是罗马人的皇帝。如果罗马城的统治权从我手中夺取了的话,那么,我将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了。”^③教皇反驳“在罗马通过神圣的手加冕以前,现在的条顿国王又是什么呢?彼得法座曾赠赐的礼品,也能够撤回。”^④卷入政教斗争的各方都希望通过历史了解双方权力的根由,“政治斗争和法律思想——尤其是关于古罗马统治威权遗产的争论——导致12世纪成为一个历史意识强烈的时期”,^⑤奥托立足于德意志政教冲突重新审视历史,他的历史意识在时代命题与基督教历史解释框架的夹缝当中获得有限的突破。

其一,奥托并非第一个政教斗争的书写者。伦巴底贵族里乌特普兰特(Liudprant)曾为奥托一世立传(*Historia Ottonis*),作为皇帝的崇拜者,描写意大利的显贵们一致谴责约翰十二世种种不堪,将其废黜原因归结为私德不修。为教皇辩护的史家,如赫斯菲尔德的兰伯特(Lampert of Hersfeld,约1024—1088年)则讲述亨利四世的臣属无恶不作,国王以屈辱的方式赶走前来投诉的百姓云云,干了“他的前辈从来没有想过的”恶事,而乌特勒支主教威廉因支持亨利四世“突然重病缠身,精神和

① 克努认为圣经主题和奥古斯丁《双城史》呈现宏大气象,参见克努(Marie-Dominique Chen)《十二世纪的神学与新兴的历史意识》,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62页。

②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第193页。

③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3页。

④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第164页。

⑤ Robert L. Benson, “Political Renovatio: Two Models from Roman Antiquity”, in Robert L. Benson and Giles Constable with Carol D. Lanham eds.,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 383.

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①“在政教合一的时期,历史只是重在收集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启示,而如今当政教开始发生矛盾和斗争时,历史已经不能置身事外,而是有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②

奥托申明“我自己,在这些事情上保持中立,以便能估量他们的说法,从而牢牢掌握真理之线,凭上帝的恩典努力地既不往左也不往右偏移”(Chron., VI. 18)。在记述显贵们召集会议废黜约翰十二世时,他写道“不管这些事情是不是合法进行的,这不是本书的目的,因为我们承担的任务是通过写作讲述发生了何事,而不是评判。”他接着批评说“我发现某些编年史记载上述约翰生活堕落,他的主教和下属经常就其行径召开会议。这些陈述看上去令人难以相信,因为罗马教会通过彼得——(教会)建立的磐石的美德,而不是地狱之门,赋予它的主教们这一特殊的特权,任何时代混乱都不能将之卷入摧毁性的毁灭”(Chron., VI. 23)。他讲述了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利七世的对峙,“罗马宗座在频繁召见无果后将国王逐出教会,出于教皇的权威和建议,阿拉美尼亚公爵鲁道夫被某些贵族推选为国王。不久鲁道夫在公开战争中被杀,洛林王公赫尔曼代替成为国王;不久他也被国王的忠诚支持者杀死”。奥托没有直接评判冲突双方的是非功过,而是感叹“我将罗马国王和皇帝的历史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此皇帝之前,哪里都找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曾经被一个罗马教宗逐出教门或者剥夺王国统治……”(Chron., VI. 35)。奥托显然不是一位轻信者,而是“牢牢掌握真理之线”,以便在真相基础上为读者提供镜鉴。

其二,双城为线求因。奥托出身皇室,任职主教,理想是在“双剑”理论(Chron., IV. Pr.)指引下的政教和谐,然而现实却是“教皇换了一位又一位,就像国王走马灯似地更换,令史家疲于记录……不仅国家因皇帝被教会开除教籍而遭到严重打击,教会因为一位伟大牧羊人的遗弃而遭遇的痛苦一点也不逊色……”(Chron., VI. 36)。皇权和教权的冲突究竟从何而起?当奥托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真相时,“双城”就成为其思考和写作的出发点。

“双城”概念源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强调上帝之城的“永恒”性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历时性的考量,《上帝之城》一书仅15—18卷涉及圣经历史内容。奥托继承这一理念,首次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共同纳入通史编年。他主张人类之初双城未分,亚当长子该隐杀弟(亚伯)开创地上之城,从而开始以四大帝国更迭为核心世俗国家演替的“俗史”;亚伯被杀后,亚当第三子赛特(Seth)成为上帝之城的首位居民,开始旧约选民的历史,基督降生后转化为教会的历史,即“圣史”;君士坦丁大帝皈依标志两城重新合一,进而叙述罗马帝国和教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奥托将双城作为人类历史实践的主体交错编年,“去分析感觉,观察事件的逻辑顺序和成因,把同属一类的东西归纳起来”,^③“在按册和按时期对自己那杂乱无章的材料进行实际分类时,表现出一种非常理性的历史观”。^④

其三,重塑历史进程。奥托试图通过双城编年“发现神圣的计划和其中的信息”,^⑤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而非当下表象或个人私德寻找本源性的原因,将上述所有政教冲突事件纳入双城此消彼长和帝国转移的宏大叙事,造就了《双城史》与众不同的“厚古”特征。

① *The Annals of Lambert of Hersfeld*, trans. by G. A. Loud from *Lamperti Monachi Hersfeldensis Opera*, in Holder-Egger, ed., *MGH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Berlin, 1894, p. 1076.

② 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中世纪时期)第231页。

③ 克努(Marie-Dominique Chen):《十二世纪的神学与新兴的历史意识》第354页。

④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第171页。

⑤ Hans-Werner Goetz, “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in Gerd Althoff, ed., *Medieval Concepts of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4.

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旨和更广阔的关切”,^①往往表现出通史特征:时间纵贯创世直到当今,空间上囊括时人所认知的整个世界,理论上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编年。然而“神学层面上所假定的基督教史纂的普遍主义,与实际史书中非常有限地表达出来的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反差”,^②所谓通史停留在观念层面上。例如《反异教史七书》开篇介绍了整个世界的地理构成,时间也从创世直到当代结束,然而古史和其他地区历史所占内容极少,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只能被当做一种修辞手段,^③自然“薄古厚今”。^④ 政教冲突时期亦不乏通史撰写者,兰伯特的编年史上起创世纪下至当代,主体内容却是1040—1077年当代事件的记录;弗卢托福和吉布卢的西吉伯特(Sigebert of Gembloux, 1030—1112年)所编普世编年史中政教冲突并非当代记录的核心,更不是贯穿始终的反思主题。究其根源还在于奥古斯丁创立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奥古斯丁认为“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指上帝)掌持之中,除非你把持它们,便没有今古。‘你的年岁终无穷尽’,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暂的尺度……昨天和过去的一切,为你是今天将做,今天已做”。^⑤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积淀的厚度面对永恒之神几乎没有意义,从而造成基督教早期通史著作普遍缺乏历史进程意识。

奥托为了“从这些事件的总和中挑选出的事件,对当今世界的形态、对现在生活着的这一代,有着无可辩驳、有迹可循的本质影响”,^⑥大费笔墨梳理当代以前双城纠葛发展的历史。1—4卷处理截至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古代历史,5、6两卷讲述查理曼帝国及之后的历史,第7卷才开始处理十字军东征到1146年的当代历史。皮特·卡拉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双城史》的历史内容“八卷占其七,真正的主题是进程(*progressus*)”。^⑦ 《双城史》将上帝之城的居民描述为一个从犹太民族演进为基督教会的历史共同体,与四大帝国更迭的俗史交错编年,共同推进,上帝之城高悬的恒在性质因而增添了历时性和跌宕起伏,人类历史被描绘成从原初状态走向分裂多元朝向末世发展的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原本只具备神学象征意义的“扁平”的过去出于作者的当前关切而重获生机。

《双城史》为早期基督教通史著作重塑历史进程,不自觉地将历史进程感植入奥古斯丁开创以来的历史哲学,因此菲力克斯·费尔纳认为奥古斯丁是一位历史哲学家(*the historical philosopher*),奥托则是历史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history*)。^⑧ 与此同时,《双城史》借助通史的广度和深度重构一个相对丰富的过去(*past*),成为基督教通史从观念落实到编纂实践的重要一步。

结 语

《双城史》总体“讲述悲惨的故事,通常可以通过对愚蠢和罪恶的惩罚得到圆满的解释;乐观只

① Deborah Mauskopf Deliyannis ed., *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2003, p. 17.

② 努斐伦(Peter Van Nuffelen):《超越罗马:普遍历史与外方人》,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第269页。

③ 努斐伦(Peter Van Nuffelen):《超越罗马:普遍历史与外方人》,第271页。

④ 参见夏洞奇《奥罗修重放光芒》,《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

⑤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页。

⑥ 席勒《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参见刘小枫编《从普遍史到历史主义》,第172页。

⑦ Peter Classen, “Res Gestae, Universal History, Apocalypse: Visions of Past and Future”, in Robert L. Benson and Giles Constable with Carol D. Lanham eds.,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 400.

⑧ Felix Fellner, “The ‘Two Cities’ of Otto of Freis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athol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164.

是偶尔的迸发 特别是在他概览早期作者和处理当代时”。^① 然仔细深究,该书从时间编排、空间建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令人类历史呈现出一定的进步趋势,卡尔·F. 莫里森从诠释学循环论证在《双城史》“讲述罪恶导致的人类分裂和世界衰亡这种沉闷的末世叙事的同时,还存在第二种完全不同的叙述。他的思想如此复杂,以至他还能以一定方式教导说所有人类一体,世界历史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发展追寻人的提升”。^② 这就是蕴含在《双城史》深层的调性矛盾,抛开文本,作者的认知矛盾究竟根源于何处呢?

奥托青年时代曾经远赴巴黎求学6年,尚在形成中的巴黎大学已经名师汇聚,从《双城史》引述的著作、观点和文史知识中,可以看到作者深受12世纪文艺复兴思想的激荡。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思想领域萌生一些新的观念和做法,例如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t. Victor)提出文化转移论、哈维伯格的安瑟伦(Anselm of Havelberg)写作中表现出进步感、奥得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撰写跨境的《教会史》、弗卢托福扩大史料范围等,“这个时代更为活跃的生活自然带来了思想的普遍活跃”,^③也为奥托编纂《双城史》提供了思想工具。他以新时代的时间敏感性调和基督教一元年表与俗史时间,从古代思想遗产中找到帝国转移论调和民族国家兴起与普世历史的统一性,以“双城”为线索寻回基督教通史著作丢失的历史进程感。可惜调和策略未能获得完全成功,以双城为线梳理人类既往历史颇多破绽,不能妥善解释标志双城合一的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政教冲突,帝国转移模式也时常难以以为继(Chron., VI. 9),最终只能仰赖末世论。奥托已经“意识到处于社会集体形式和代际更替中的人类生活”,^④却不能突破教父们奠定的历史解释框架,既不愿意挣脱四个帝国模式去承认民族国家的优先性,^⑤也无法彻底突破一元世界年表。《双城史》的调性矛盾深刻反映了12世纪历史意识进展与传承下来的基督教历史解释框架之间无可避免的摩擦,表明中世纪盛期西欧剧烈变动的社会对“过去”(past)和历史学(historia)均提出了面向现实的要求。

1157年,大约《双城史》修订本献给皇帝的同时,奥托受命并亲笔撰写了《皇帝腓特烈传》的第1、2卷,该书“在主题、基调和观点上,与前一部著作大不相同”。^⑥有趣的是该书第1卷与《双城史》第7卷大体重合,从1076年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利七世的冲突开始讲述,结束于1152年腓特烈登基,奥托却不再将之作为世界走向分裂和衰亡的证据,而是“把这些事件当作弗里德里希·巴巴诺萨的光荣统治的序幕来叙述”,^⑦他放弃调和神学与历史进展之间的不合。

(作者汪丽红,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旭鹏)

① Denys Hay, *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p. 53.

② Karl F. Morrison, “Otto of Freising’s Quest for the Hermeneutic Circle”, *Speculum*, Vol. 55, No. 2, 1980, p. 214.

③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第7页。

④ 克努(Marie-Dominique Chen):《十二世纪的神学与新兴的历史意识》,第339页。

⑤ 这个任务直到14世纪才完成,让·德·圣维克多(Jean de Saint-Victor)1309—1322期间撰写的《历史记忆》(*Memoriale Historiarum*)就认为1245年帝国转移终结,世界回归独立王国这种原初的自然政治状态。

⑥ Otto of Freising and Rahewin, *The Deeds of Frederick Barbarossa, Introduction*, trans. C. C. Miero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⑦ 亚·德·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科学》,庞卓恒、李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54页。

can always coordinate. Yet they are in a state of coope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Rule b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 Inquiry into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Governance // Liu Wei

The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tes” and “law” and between “rule by rites” and “rule by law” have changed from the one on antagonism to the one that emphasizes fusion and hybridity in modern tim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analys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nscend the conceptual settings an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original forms of these concepts in “rule by heaven,” “rule by virtue,” “rule by rites,” “rule by punishment,” and “rule by man,” and of principles of Chinese governance including “rule by heavenly principles,” “behave by virtue,” “rites as law,” “punishment as the guardian of the law,” “man as the essence.” All these element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stability, and hav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original legal principle. All above constitute the “rule b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core is the rule of virtue and rites, which is based on the rule of taking punishment as the guardian of law and treating man as the essence. It was thus concluded as “rule by rites” by later generations.

Liang Qichao’s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Gushibian Movement // Li Changyin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Liang Qichao’s proposal for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Gushibian (debate o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Gu Jiegang was inspired by Liang Qichao’s articles, such as *A Narrative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New Historiography*, *Observ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n History* and *Treatise on the Trends in Chinese Geography*. He established the “accumulation theory”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n proposed “to challenge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was of one single origin” and “to challenge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territory was always of one unitary who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Bo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Confucius by Gu Jiegang and the re-evaluation of Confucius by Feng Youl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Liang’s works such as *Protecting Confucianism as a Religion Is Not Showing Respect for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After that, the focus of the movement turned to exami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Liang Qichao furthermore had impact on Hu Shi who argued that “classical schools of philosophy did not originate in officialdom” and Luo Genze who investigated the origins of these various schools through his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Therefore,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dvocated by Liang Qicha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ushibian Movement.

Approa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Management and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 Geng Jin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management follows several approaches, that is, the technological aspec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 and the ecological aspect. The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adopts water conservancy as the entry point through which to discuss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state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region. The ecolog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combines perspectives from both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regional hydr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present different paradigm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with prominent research outcome. However, a focus on research paradigm tends to underplay the value of detail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needs to show more complex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behind water conservancy. The introduction of landscape history is an excellent attempt to broaden the horizon and diversify the approaches of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in China. It returns to focus on “water conservancy,” the essence of the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and shows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 with water conservancy as being at the core.

The Two Cities by Otto of Freising and 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 Wang Lihong

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 D. was written by Otto, Bishop of Freising. It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work known for its promotion of eschatology. It also stands out in the

west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or its brilliant view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Otto of Freising reframed the entire history of mankind with two historical lines, the City of God and the City of earth, and then brought the sense of process back to the universal chronicles. Otto of Freising reflected the unitary world chronology of western Christendom from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 Spatially, he further elaborat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 imperii*. He attempted to search for origins of th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through history. He was not intended to invent new theories, but to objectively rescue the deconstructed sense of time for Clio since *The City of God* by Augustine. *The Two Cities* is an example indicating how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in need of a more complicated narrative on past and histor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and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historiography.

The Achievements and Dilemmas in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a // Xu Shanwei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 line with global view of history has started since World War II, and gradually reached prosperity after the 1990s. The article selects four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textbooks for a brief analysis, pointing out the unique aspects of their theories and method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view transcending nation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e theory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etc. However, there remain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writing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of which the most prominent one is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rol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resulting in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 within various civilizational systems and its impact. That leads to the im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is also caused by Western scholars' deviation in the ado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Both as Foundation and Method—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 Xiang Yannan

As a reflective discipline, historiography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Yet its significance, as a matter of fact, is often not valued by some historians. One may appreciate the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s a secondary discipline under history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setting regul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is a recog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Secondly, from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epistemology), future generations can only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through historiography. Objective history cannot be repeated, and historical text as a substitute for real history serves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Therefore, to a certain degree, all history has the nature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Thirdly, d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istoriograph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ext o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based. Consequently, historiography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but also a significant research method. To establish a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ography will further the pursuit of truth.

World Perspectiv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anmu Zheng as a Historian // Huang Xiaoyu

Professor Duanmu Zheng is a famous Chinese legal scholar and historian. After his return from France, he followed the order and switched to teaching world history dur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e then became a pioneer who lectured on courses on "modern world history" in China. Although he was mistakenly classified as a "Rightist" in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he did not give up on translating classical works and writing academic textbooks on world history. These effort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Duanmu Zheng has devoted himself to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Society o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and cultivated a scholarly team o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To celebrate his one-hundredth birthda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Prof. Duanmu Zheng's scholarly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ography, and conclude his contributions to World History Studies and French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